

生活藝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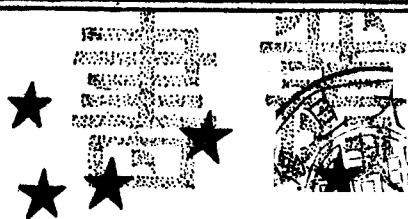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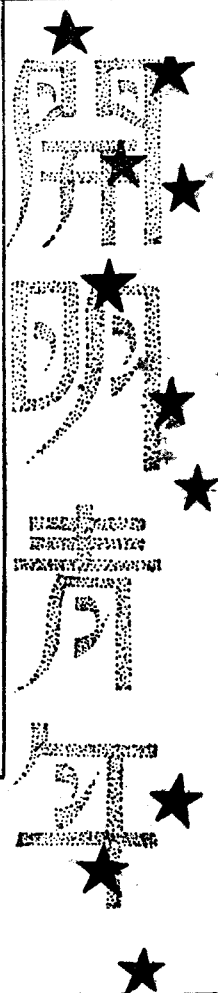
曹孚著

生 活 藝 術

曹 孚 著



開 明 書 店



生 活 藝 術

民國三十五年八月月初版

民國三十六年一月再版

每冊定價國幣一元八角

印刷者

開明書店

發行者

開明書店
代表人范洗人

著作者

曹

孚

有著作權*不准翻印

(89P.)K

孚

從勵志哲學說起（代序）

中央大學師範學院的龔啓昌先生，曾就重慶，成都，貴陽三地的三所中學的學生八零七人，施行閱讀興趣測驗，結果發表於教育通訊上，列舉高中學生喜歡閱讀的書籍十八種，拙譯勵志哲學一書也僭佔一席。其餘十七種是：水滸傳，三國演義，愛的教育，紅樓夢，家，福爾摩斯偵探集，總裁言論集，給青年的十二封信，子夜，大眾哲學，經史百家雜鈔，吶喊，天方夜譚，老殘遊記，春，俠隱記，滅亡。龔先生特別指出，勵志哲學一書，在高中學生中，「較佔相當勢力」。而於結論之中，提出「作者應寫作同樣生動而有趣味的讀物」的建議。

八百零七個學生的閱讀興趣，能不能代表全國中學青年的閱讀興趣，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。其次，讀者羣最廣泛的書，不一定就是最有價值的書。就說這十八種書吧，雖然同受中學青年之歡迎，但其比較價值，有些是不可同日而語，因而會使有些作者生羞與爲伍之感。最後，勵志哲學一書，是譯而不作，假使還不爲讀者所摒棄，那是原著者的功績，並無譯者沾沾自喜的理由。不過，翻譯譬如借花獻佛，再賠上一個花瓶。花由我獻出去，居然爲廣泛的青年讀者所欣納，這究竟是值得高興的一件事情。

於是我想接受龔先生的挑戰。但隨即聯想起一個嚴重的問題。若干年前，滅亡與家的作者巴金先生與給青年的十二封信的作者朱光潛先生，兩人之間，動了一場筆墨干戈。巴金先生說朱先生的給青年十二封信足以貽害青年，應該焚燬。我得自己來一個檢討，像勵志哲學那一本書，流佈人間，是否貽害青年，因而理應焚燬，「這部書的布爾

喬亞意識太濃厚，應該做一篇長序加以說明，」在談判該書的承印問題時，記得開明書店的總編輯夏尊先生曾經對我這樣說。是的，應該作一篇解釋的長序。這序文我打算於再版時刊印出來。但一個月就再版了，又三個月而三版，太快，序文未能趕上，以後也就懶得提筆，以至於今，彷彿對着讀者，精神上欠着一份沈重的債務，現在是償債的時候了。

那本書的主旨，在教人「成功」，其出發點完全是個人主義的。請聽他對於「卻貧」及「致富」問題的說教吧：「世間大部份的貧窮，都是由『懶怠』所造成，都是由奢侈、浪費及不願努力不肯奮鬥所造成。」他忽視了社會的經濟制度在人們窮富的分野上所起的決定作用。因此，他的「致富」的方案也是個人主義的；他所着眼的，是富的個人，不是富的社會。這類說教，如像有人指出，是對着青年的眼睛撒擲灰沙。這些，以及類於這些的議論，是勵志哲學一書的不可掩蓋的缺點。但是，世間少有完善的書，正像世間少有完善的人一樣。書之為益為害，是好是壞，繫於讀者之是否善讀。

譬如，這卻窮致富的問題，你可以同意作者「貧窮的本身是一個罪惡」的一句話。你也可以同意「致富是一個人的合法的願望」。「世間的種種幸福，享受，是應該大家有份的，所以你也當在不妨礙，不剝奪別人的份兒的條件下，去取得你的份兒。你是應該得到『富裕』的。那是你的天賦權利。」在這裏，你得特別注意「應該大家有份的」，注意「在不妨礙，不剝奪別人的份兒的條件下。」你得明白，富裕不但是「你」的天賦權利，也是「大家」的天賦權利。再說，作為解決社會貧窮問題的對策，去除懶惰，浪費，以及提倡努力，奮鬥是不够的。但對於個人，這些說教還不失為有用。

你知道不知道魯迅學醫的故事？魯迅原來在日本的一個醫學專門學校中學醫。他對於醫學的夢很美滿，以爲平日可以救治病人，戰時可以充當軍醫，而且又可促進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。教微生物學時，教師是利用電影的，以顯示微生物的形狀。爲填足時間，有時也放映些風景與時事的畫片。時值日俄戰爭，有一次他在影片上發現了「久遠」的中國人了：「一個綁在中間，許多站在左右，一樣是強壯的體格，而顯出麻木的神情。據解釋，則綁着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，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衆，而圍着的便是來賞鑑這示衆的盛舉的人們。」於是他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，於是他脫離了那醫科學校。「凡是愚弱的國民，即使體格如何健全，如何茁壯，也只好做毫無意識的示衆的材料和看客，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爲不幸的。」

郭沫若先生原來也是學醫的。在畢業於日本的醫科大學之後，他不肯開業行醫，理由之一，據他在一篇小說中的自白，是窮人無力到他地方去就醫，富人呢，他不願爲之診治。話雖如此，醫學究竟是值得人攻習的，醫生總也不失爲人間有用的一種職業。體格健全茁壯的人可以做救國志士，也可做漢奸賊子。但健全的體格總不失爲人生祝福之一。大衆的衛生，正如克魯泡特金在給青年醫師的公開信中所鄭重指出的，實決定於大衆的工作與生活狀況，因而在大衆的生活、工作狀況改善之前，醫生的工作是徒然的勞力。但我們也不能因此而對於醫學事業，衛生運動袖手。

你可以用這種態度去接受勵志哲學中的說教。我不妨將一個生疏的名辭，「早熟」地介紹給我的讀者嗎？「心理衛生」下回，對於心理衛生的意義與內容，我將作一個詳盡的介紹。在這裏，我願意提這樣的一筆：勵志哲學那部書，是一本心理衛生的好教本。在消極方面，它教人不要煩悶，不要恐懼……積極方面，它教人自信，自恃與自助，教人

注意身心的健康，善用生命之資本。它鼓勵人做夢想者，鼓勵人願望，鼓勵人期待……勵志哲學一書原名效率之訓練，而心理衛生也正是着眼於整個人生效率之增進。凡我們所以肯定生理衛生，生理醫學之價值的理由，也就是我們可以肯定心理衛生與精神醫學之價值的理由。雖則像火一樣，效率是忠實的僕人，同時也是危險的朋友。但是難道我們就因此而對「效率」關門嗎？

有對勵志哲學這類書的功効懷疑的人。這裏存在着一個性行之改變的問題。有人認為人的性行大體上決定於先天的遺傳。優生論者如此主張，一部份的心理學家，如像英國的麥孤獨，也有此種說法。其次是環境論者的社會決定論。這裏就牽涉到自由意志之有無的問題。當然，分析到最後，個人的一切品性行為，都形成於社會的環境。但就在「環境決定」之大範圍以內，可以容許個人意志自由活動的天地還相當大。對於自己命運之決定，性行之型成，主觀意志，個人努力，至少是因素之一。過份信仰主觀意志，個人努力，固然如杜威所說，不啻信仰「道德魔術」；然而「改造環境先於改造個人」的理論，推到極端，容易流於機械的環境宿命論的。勵志哲學一類書特別強調主觀努力在個人生活中之重要性，而人類的道德教育，乃至全部教育之可能性也就寄寓在這種假定中。

所以，我想，依中國背景，寫作勵志哲學一類的文字，濾淨了其中的個人主義與市儈氣息，對於中國的青年讀者，應該是十分有益。這類文字是屬於所謂青年修養類。我之所以發揮如上的一大串議論，為青年提供一種閱讀一般青年修養類書籍的態度者，其意義尤甚於對勵志哲學的讀者清償精神上的債務。青年是需要這類讀物的，這需要反映於勵志哲學一書的龐大的銷路上。青年期是人們對人生之意義開始覺醒起來的時期。用龔啟昌先生的話，他們開始「追求為人處世的道理」。所以在這方面，青年人應該得到良好的指導。假使「一年之計」在於春天，那麼

「一生之計」是在於青年，青年是人生中的春天。請記取俄國育目詩人愛羅先珂的教訓吧：「我們在春天所播種的，我們在收成時候就可以收穫。全年的幸運都倚靠我們的春天的工作，饑荒缺乏以及一國的別的一切不幸的根也都長在春天裏。」

寫作青年修養談，文字最好取談話的體裁。為什麼不用書信體呢？因為「給青年×××信」已經有人專美於前，未便東施效顰，此其一。其次，本書各篇，都相當冗長，假使它們是書簡，那豈不成爲「萬言書」？再說，以青年導師自居，是我所萬萬不敢的。我想竭力避免說教的口吻。不過，蕭伯納在一個劇本中，曾經挖苦一個宣教師，「他只會說教，不會談話。」這種挖苦也可以適用於教師頭上。作者是過去濫竽中學而現在又抗顏大學的人，教師做久了，說話之間，假使力求不說教而終於說教，而書袋又掉得太多的話，應該請讀者特加曲諒。

將生活藝術的名稱，冠諸在性質上可以彼此獨立的十二篇文章，是經過一番斟酌的。假使修養被解釋爲整個生活之修養，那麼青年修養就是生活藝術之講求。生活是一個藝術，像演戲，彈琴，打球是一種藝術，至少。但生活的藝術自來就少有人注意到，所以在生活舞臺上，各個角色的演出往往是拙劣的。林語堂先生曾用英文著生活的重要性一書，其中文譯本被冠以生活的藝術之書名。其中討論的題目多偏於生活之享受方面。這個對於目前中國青年，我想其「重要性」是不大的。

當代法國文豪莫洛懷近著生活藝術一書，頗爲世人所推崇。當我動手撰述此書之際，該書尚未被介紹到中國。後來它的譯本以處世藝術的名字出版了。其所討論的題目一部份與本書所討論者相同，但其內容鮮有「暗合」。也許譯文損傷了原著的精彩吧，拜讀之餘，並不使我生自慚形穢之感，而使我將本書問世之心。譯者既然避免生活

藝術的書名而不用，這名字由我使用，諒來可免冒牌與借光之譏。

「處世」兩字，從其壞處講，是「應付」、「敷衍」、「世故」；「藝術」與「處世」兩字聯用，藝術就成為「手段」。而青年人正是不應太世故，不該玩手段的。有人在某報的副刊上，對勵志哲學及處世教育兩書，並加批判。處世教育教授我們交朋友的方法，他說，完全是吹牛，拍馬，戴高帽子的虛偽的欺詐的方法。處世教育一書，我未曾寓目，在勵志哲學一書中，則我記不起曾有此種說教；假使有的話，這類書正是貽害青年，應該加以焚燬。不久以前，中央圖書審查委員會曾禁燬青年修養譯本一種，書名記不起了，禁燬的理由大概是說那本書教人吹牛拍馬，欺世媚人，足以敗壞青年人的心術，使之成為老奸巨猾。這查禁的理由是正當的，我們同情這賢明的查禁。

欺世媚人的修養談，在中國是古已有之。在顏氏家訓的教子篇中，有這樣一段話：「齊朝有一士大夫，嘗謂吾曰：『我有一兒，年已十七，頗曉書疏。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，稍欲通解，以此伏事公卿，無不寵愛，亦要事也。』」顏之推在這段話下面，加上這樣的按語：「吾時俛而不答。異哉，此人之教子也。若由此業自致卿相，亦不願汝曹為之。」

在外國也有齊朝士大夫一類的人，那是英國的蔡司菲爾德勳爵（Lord Chesterfield）。他的教子書是出名的。在那些書簡中，他教他的愛子講究儀節，媚悅他人。與他同時的大文豪約翰生（Johnson）曾譏之為「娼婦的道德，舞男的儀節」。他教他的愛子不要開罪他人，對一切人要維持「謹慎的中立」，就是對傻瓜與惡棍，也不可樹敵。這正是目前大部份青年修養書所給予青年人的說教。他們教青年人獲得他人好感，博得他人歡心，不惜用一切手段，也不管對什麼人，在什麼場合！

這種媚人哲學之最惡劣之表現是脅肩諂笑，唯唯諾諾的小人。比較略為高明一點的是鄉愿，非希志講德意志

民族的新教育，主張將青年人培養成自生命深處「好」起的人。在外表上有用或無害是不够的，他說：必須使青年人在內心上，在本質上「好」。而所謂鄉愿，正是在外表上好而在內心上壞的人。孔子最痛心疾首這一等人，稱之爲「德之賊也」。耶穌在世時，與罪人往來，納稅吏爲門徒，獨於法利賽人及撒吐該人，則呼斥不稍假借，蓋因這類人外面好，內心壞，是漂亮墳山中的骷髏，最爲不可救藥。目前的青年修養談，大多數是鄉愿主義式的，儘教人在外表上下功夫。本書的英雄與英雄崇拜一篇，就是想辭闢這種鄉愿主義的。

若干年前，有一短篇小說，題名達生篇。主人翁是一個廚工，替某大工廠做飯。該廠的總經理是一位留洋歸國的中年人，御講究西裝，穿雪亮皮鞋，一不如意，動輒用他穿着雪亮皮鞋的腳踢那廚工的屁股。這老廚工呢？他並不怨恨，只是克勤克儉，節衣縮食，想積聚些金錢，供自己的兒子上小學，中學，大學，乃至留洋，好在將來做總經理，也穿着同樣雪亮的皮鞋，踢着與自己同命運的人的屁股。這是個人主義的青年修養談的一幅諷畫。蔡司菲爾德說：「一個青年人應該有出風頭及勝過他人的雄心。」而目前一般青年修養書之所以諄囑青年努力者，千言萬語，也無非是教青年人出人頭地，好做「人上之人」，實在是「踢屁股」一丘之貉的心理。本書的全部立場是反個人主義的；就爲這緣故，它以聖與己這一篇作殿。

最後說到市儈主義。市儈主義的特徵，據英國的王爾德說，是對於理想之麻木不仁……對於庸俗的「成功」之崇拜，完全沈溺於生活之物質的方面……「對於庸俗的『成功』之崇拜」，這不正是目前泛濫坊間的美國式的青年修養談給予青年人的暗示嗎？他們也講人格，講操守，講誠實。但這些「理想」，只是作爲達到「成功」目的之手段，因爲，「誠實是最好的政策」！所以，這類青年修養談的動機完全是市儈主義的。

市儈主義在勵志哲學一書中已經足夠多了，而繼勵志哲學而出版的許多美國式青年修養書，則自鄙以下，每况愈下。近來這類修養書在書坊間汗牛充棟，銷路驚人，始作俑者實爲勵志哲學。對於這類書籍所包含的毒素之肅清，我不說我最有資格擔任，我可以說我最有義務擔任。對於市儈主義的對症藥方是理想主義，是高級人生興趣！

我肯定青年人需要勵志哲學這類修養書。這類書對青年人在大體上是有益處的，假使他們在閱讀之時，能抱着正確的態度。但是我也就心在勵志哲學一書的廣泛讀者之中，或許有不少人未能把握這種正確的態度，因而受了它的一些毒害；對於他們，本書是一種「救贖」，一種「報效」。

朱自清先生在國文月刊上，對於中學的國文教材，有所論列。曾經提起勵志哲學，說可惜譯筆生硬，不能作爲國文範本。現在我在作創作的嘗試了。對於自己的文筆，並無「流暢」的自負，因而決不敢萌作爲國文範本野心。但是，我想，目前的中國青年，也許感到文化食糧之貧乏了吧，他們有精神的營養不足，正像他們有身體的營養不足。我的這本書，是打算作爲他們的文化「雜糧」之一種的。莎士比亞在威尼斯商人中，這樣挖苦一個人的說話：「他的議論是隱藏在兩斗糠中的兩粒麥子；要找出這兩粒麥子，你得找上個一整天。」我的文字也許正是這樣的。但在大饑荒的年頭，糠也可以充饑的；而且我總希望，在兩斗糠中，麥子的數目，或許不祇兩粒！

青年要修養些什麼

——再版序文

生活藝術一書是在三十二年十一月出版的，雖然在發行上遭遇了不少意外的波折，未及一年，居然售罄，現在還有機會交由開明書店再版發行，殊出作者之意料。在再版之際，除了校正一些因審查刪改及校對粗心所造成的錯誤外，還願意對我未來的讀者，補充幾句話。

生活藝術一書是屬於所謂「青年修養」一類的。我不曾查考過「青年修養」一辭的來歷，也不知道在外國語文中，它相當於什麼東西。但名稱是不打緊的，最重要的是內容，一部青年修養書應該講些什麼東西？或者，從讀者的觀點說，青年應該修養些什麼？

英國的蔡斯菲爾德勛爵教子書，在英國文學中，占有相當的地位。這位世故老人，在書簡中諄諄誥誡他的愛子，要講禮貌，講儀態，講「悅人之術」。這些說教，誠如與他同時的英國文豪約翰孫說的，是「娼婦的道德，舞師的儀節」。但在有一封信中，蔡斯菲爾德曾經提到，人生修養有兩個方面：內部的修養與外表的修養。精金美玉，其本質自然是高貴的，但外表也許粗糙，必須加以琢磨，始能爲人所樂用。他教他兒子做的，多半是外表琢磨的功夫，因爲他希望他的兒子將來做一位外交家。但是他沒有說，有了外表的琢磨就可以不要內部的修養——他稱之爲德性，也未嘗暗示，外表的琢磨比德性的修養更爲重要。

不久以前，某報的副刊上，曾經連續討論「磨去稜角」的問題。這所謂磨去稜角，即是外表琢磨之一端。有稜角就是粗糙。稜角不妨磨去，但不能因磨去稜角而損害了「本質」。順便提一筆，這磨去稜角的問題，在明末的被稱為東林黨人的一批學者之間，也曾經提出過。他們不大贊成磨去稜角。他們討厭鄉愿，而太着意於磨去稜角，就容易流入於鄉愿一道。

這外表的琢磨是青年修養中的一個項目，然而不是比較最不重要的一個項目。精金美玉，加以琢磨，可以分外光輝。但這光輝只能附麗於金玉之本質，若不顧本質，只知道在外表上做功夫，結果一定流於「金玉其外，敗絮其中」。數年前坊間流行的青年修養書，卻正是輕重倒置，反末為本，特別強調外表的琢磨，幾乎以此外表的琢磨為青年修養的全部的著作。

蔡斯菲爾德在另一封信中，曾經以品格 (character) 與道德 (virtue) 並舉。據他說，一個人即使不贊成「道德」，卻仍然可以贊成「品格」。他並沒有說明道德與品格之異同。也許因為，在英國語文中，道德與品格二者之間的不同是「自明」的。但在中國語裏，品格與道德似乎混不可分。我們可以舉一二例說明二者之區別。譬如勇敢。勇敢自然是好的，但勇敢的人可以見義勇為，勇於為善，也可勇於為非作惡。做大善事需要大勇氣，做大惡事也需要大膽量。勇敢只能算是品格而不是道德，有勇的人不一定是道德的人。再譬如自信。自信是偉大人物的主要成功因素之一，但巨奸大慝之所以成其巨，成其大，也往往得力於他們的自信力。像希特勒這類人自然是最不道德的人，然而他也許不缺乏某些良好的品格，譬如勇敢與自信。

所以，僅僅講品格是不够的，而目前一般談青年修養的人，似乎只講品格而不講道德。也許他們講道德，但事實

上他們所講的只是品格而不是道德。在另一方面，假使有人寫道德修養一類的書籍，恐怕也難於為青年讀者所接受。青年是最厭聞仁義道德的。青年人對復古的傾向幾乎有本能的憎惡；而提倡仁義道德的人，往往是在思想上開倒車的人。這是理由之一。其次，仁義道德的說教，有時會受野心家的利用。這情形是古已有之。我們知道，老莊是反對儒家的，尤其反對儒家仁義之說。他們反對仁義，當然有其哲學的立場與意義，然而分析其動機，這種偏激的主張，實在產生於憤世嫉俗的心理。

但是，道德修養應該在青年修養中占一重要的位置。「魔鬼也會引證聖經」，然而魔鬼自魔鬼，聖經自聖經。我們不能因為不信任滿口仁義道德的人而懷疑到仁義道德的本身。

在我們日常語彙中，人格與道德，幾乎是異名而同義。我們說某人人格好，即是說某人道德好；某人沒有人格，即是說某人不道德。若照現代心理學家的說法，則人格乃是一個人所以為人的諸特徵的總和。它有多方面的構成因素，道德及品格只是諸構成因素之一。究竟構成人格的是哪些因素，各家主張，頗有出入。有人說，人格構成於下列諸因素：一、體貌，二、心智，三、學養才能，四、品格，五、社交性能，六、情緒傾向（包括脾氣、氣質），七、意志。假使我們認為青年修養應以整個人格修養為目標，則青年修養的內容應該包括：體育修養，道德修養（包括品格），情緒修養（包括脾氣、氣質），連禮貌、儀節，「悅人之術」之講求，以及一切外表琢磨的功夫，都可包括在人格修養範圍之內。它們一部分屬於社交性能，一部分與情緒傾向有關。

現代人對人格兩字的看法，逐漸由倫理學、道德學的轉變而為心理學的。培養優美的德性與品格是一回事，建立和諧而均衡發展的人格又是一回事。說「和諧」與「均衡」即是表示人格之多方面性，表示人格構成之不止

一端。人類的精神或心理活動，用普通的分類，有智慧、情緒的、意志的三個方面。所謂和諧與均衡的人格，即是知情意三方面有和諧均衡發展的人格，而現代心理學家，尤其心理衛生家，似乎特別強調情緒生活在全部人格構成中所占之地位，所起之作用。我在心理衛生一文中說過，心理衛生之最高目標，乃是發展人格至最高限度。而心理衛生家所說的心理衛生，主要的就是情緒教育與情緒衛生。我們講人格修養，一部分的材料應該取諸心理衛生學。心理衛生的修養是人格修養中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。

最後，我們有所謂「文化修養」。照一般人的想法，文化修養只是知識學問的修養。羅家倫先生於其新人生觀一書中，列文化修養一章，所講的只是藝術修養。其實，廣義的文化修養應該包括藝術修養、智育修養（學問與智識只是智育修養中之一部分）、道德修養乃至體貌修養。假使我們採取這種廣義的看法，則青年修養與文化修養，在大體上同其領域。

我們在上文列舉青年修養之各個方面：從「外表琢磨」而品格，而道德，而整個人格修養，而廣義的文化修養。我們的結論是：青年修養所應包括的項目是：「外表琢磨」功夫、品格、道德、智育、體貌、美育（藝術）、心理衛生（情緒修養）。當然，我們不能期待一部青年修養書，能够在上述諸項目上，討論無遺；正像我們不能希望青年在各個修養方面上能够面面俱到一樣。在這裏，輕重緩急的考慮是應該有的。

說到輕重緩急，我以為道德修養在全部青年修養項目中應該位居第一。從前我國人講修養，除了道德修養以外，更無其他。這是「過」。現在我國人講修養，似乎太忽略了道德修養。這是「不及」。

法國有一位哲學家曾擬訂道德規律一百數十條，附以說明，遍徵法國全國哲學家、倫理學家、教育家的意見；然後整理歸納，編印成書，作為學校中的「道德科」教本。我以為道德規律是不能列舉的，也無需列舉。這一類教本，我國的青年讀者，並不需要。青年人假使要講道德修養，那只是「大德不逾閑，小德可以出入」的道德修養，我們對青年之道德生活所要求者只是個大宗旨大方向不錯，在細枝末節上，似可不必求全責備的。

在道德修養的討論上，我們首先要解決的是公德與私德的問題。據梁任公先生說，數千年來，我國人只講私德，不講公德。依我國人的道德實踐說，情形誠然如此。但在我國的倫理思想，尤其儒家的倫理思想中，公德並未被抹殺。儒家的「大學之道」有兩大目標：一是「明明德」，一是「親民」。明明德即是私德，親民，用現代語彙說，是愛國家，愛民衆，乃至愛世界，愛人類；為國家，為民衆服務，乃至為世界，為人類造福。這就是公德。

明德與親民是一件事情的表裏。明明德乃是為了親民，親民必須以明明德為準備。這是事情的一方面，在另一方面，唯有通過親民的實功，明明德纔能獲得真正的實現。而後代的儒家卻將明親兩事，分成兩概，把他們機械地對立起來；而且有側重明德，不講親民的趨勢。這種傾向甚至在一部分宋明理學家中也曾引起批判。譬如王陽明，他強調明親之不可分性，主張「親民即明德之事。」

故明明德與親民的功夫必須聯系統一起來。有了這種聯系統一，則我們既做到明明德，也做到親民。若明德自明德，親民自親民，則所謂明德必非真明德，所謂親民必非真親民。

儒家又有出名的「八條目」之說，即是格物、致知、正心、誠意、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。這八條目即是修養上之八種功夫或八個階段。宋人將這八段功夫，大別之為兩截，上半截是誠正之功，下半截是治平之事。誠正相當於上文所

說的明明德，是私德。治國平天下，用現代語彙說，是把國家弄好，把世界弄好，相當於上文所說的親民，是公德。宋人把誠正與治平對立起來，如像他們把明明德與親民對立起來一樣。他們所犯的最大毛病之一，即是修言誠正而忽視，乃至鄙視治平。其實這八種功夫是一個有機的體系，先後必須聯系，首尾必須貫通。所謂正心誠意，必須是正心誠意於治國平天下；否則正誠功夫，即成空洞無內容的概念。所謂治國平天下，必須出之於真心誠意，否則居心不正，立意不誠，即是口是心非，冒名撞騙，說治國平天下必至於誤國亂天下。

在正心誠意之上，還有格物致知兩段功夫。宋明理學家在格致與誠正之關係上曾經展開過繁瑣的論爭。我不打算為我的讀者敘述這一篇宿帳。用現代語彙說，所謂格致，即是把握正確的思想方法，對治國平天下的道理與方法，作正確的認識。對國家與天下的大事，僅僅正心誠意還是不夠的，必須輔之以對事理之正確的認識。否則「誠」只是「愚誠」，動機即使真誠，居心即使端正，結果還是不能收治平之效，甚至反而會誤國家，禍天下的。

我從公德與私德的討論引出了正誠治平的一套老議論。我的目的在於說明：公德與私德的區別事實上是不存在的。我們日常所說的公德與私德，事實上只是大德與小德。一個人不抽煙、不喝酒、不嫖、不賭、不說謊，我們說他私德好。其實不抽煙等等只是小德。治國平天下纔是大德，而治國平天下又必須以正心誠意為動機，格物致知為指導。故大德是統一公德與私德的。孔子說：「苟志於仁，無惡焉。」孔子認為仁是最大之德，最高之德。凡能做到「仁」的，在小德上即使有失檢的地方，那只是過失而不是罪惡。

然而，我為什麼一定要引證古人的陳說呢？因為我國是被認為倫理學最發達的國家，如像羅素說的「沒有希伯來，沒有宗教；沒有中國，沒有倫理學」，而我國的倫理思想（主要的是儒家倫理思想），卻少高深理論，而多實際